

中國對外經濟的非均衡分析

●厲以寧

本文是一篇純理論探討的作品，專就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陳述個人的見解。它的中心思想是：當前的中國經濟處於特殊的非均衡狀態，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特點正是由此決定的。因此，一般的經濟調節措施對中國對外經濟活動必然收效甚微，唯有使企業真正取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地位，調節措施才能發揮作用。

一 非均衡經濟的類型

經濟均衡一般是指所謂瓦爾拉（Walras）均衡，亦即在完善市場和靈敏價格體系下所達到的均衡。在此情況下，價格隨供求變化而時時調整，需求與供應都相等，因此超額需求和超額供應都不存在，生產過剩、商品滯銷、失業、通貨膨脹等等現象也都不會出現。

顯然，瓦爾拉均衡是不現實的。現實社會並不是一個拍賣行，現實經濟也並非由反覆喊價，然後拍板成交的權威拍賣商來操作。在現實經濟中，信息並不完全，價格也不盡靈活，所以某種「非均衡」是難以避免的。這種「非均衡」的含義是：價格不能充分自行調整，因此供求不盡相等，而且不能恢復到相等狀態，但此時各種經濟力量卻會根據具體情況而調整到彼此適應的位

置，並在這個位置上達到均衡。換言之，實際經濟只能處於非瓦爾拉式的、有一定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均衡。

但就中國經濟而言，更基本的決定因素則是微觀經濟單位（企業）是否有充分活力。只有在微觀經濟單位能自主經營的基礎之上，完善的市場才有可能形成。因此，我們可以把經濟的非均衡分為兩個類型。

第一型是指下列情況：微觀經濟單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有充分活力的獨立商品生產者，但由於資源供應的限制、利益集團的干擾或其他因素，所以市場仍不完善，價格仍然不靈活，超額需求或超額供給依然存在。

第二型則是指在下列狀況下所形成的不均衡：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還沒有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不具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選擇權，或者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顯然，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是處於第二型非均衡狀態。

二 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的對外經濟活動

對外貿易和外資利用，都可視為國內資源配置的延伸。因此，要了解對外

貿易、國際資本流動以及相關的國際收支狀況，應當首先了解國內資源配置的特點和機制。因此，為了說明現階段中國對外貿易與國際收支的狀況，先要對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國家資源配置的特點加以分析。

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微觀經濟單位並非利益主體，生產經營成果與本身利益並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它不可能以經濟效益作為標準來決定資源投入方向和數量，市場也缺少糾正不合理資源配置的機制。縱使市場因為資源利用效益低而傳出如貨源緊張、市場疲軟、價格波動等等信號，但微觀經濟單位則缺乏機動或能力來調整資源投入與組合的形式。這樣，就可能導致政府以非經濟干預方式進行調整，或者引起地下經濟活躍，使得經濟混亂加劇。而通過非經濟干預方式進行調整，那就必然對微觀經濟單位的活動作進一步限制，再削減其活力。其結果是，資源供求的緊張狀態縱使得以暫時緩和，資源配置的失調狀態將更加持久化、複雜化，更難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如果地下經濟活躍，那麼儘管供求矛盾暫時緩和，但整個經濟為此則須付出沉重代價。代價之一是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收入分配進一步失調。代價之二是資源配置被大大扭曲，使某些部門繼續陷於困境，另一些部門則出現不正常的畸形發展。

其實，在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即使政府試圖採取經濟手段進行調節，這些措施也同樣可能引起資源配置困難的加劇。原因在於微觀經濟單位決策者不必依據經濟效益標準來作決策，所以資源投入的約束機制不起作用；換言之，微觀單位既沒有合理、明顯的資源配置利益，政府也就無從了解個別資源調整方案。它的後果：得到的是混亂、不正確的信息，政府的經濟調節成為扭曲的、缺乏客觀依據的措施，只會加劇資源配置的失調。

現在讓我們來看對外經濟活動。假定對外經濟活動只包括對外貿易，那麼

要取得經濟內外同時均衡，必須使得投資與儲蓄相等，以及進口與出口相等。在非均衡條件下，投資與儲蓄的相等是不容易實現的，從而進口與出口也難以相等。不僅如此，即使進口與出口相等了，但由於投資與儲蓄不相等，結果仍然是社會總需求不等於社會總供給，均衡依舊實現不了。

實際上，投資與儲蓄若不相等，進口與出口的相等只是一種純理論假設。因為要使得進出口相等，一個條件是匯率等於貨幣價值。如果匯率高於貨幣價值，進口將超過出口；反之，如果匯率低於貨幣貶值，出口就將超過進口。另一個條件是：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須保持不變。在匯率為既定的條件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變動，自會引起進出口量的變動，從而也就破壞了對外均衡。

倘若投資與儲蓄間的均衡不能維持，那麼上述的對外均衡條件也是不能成立的：若投資與儲蓄之間缺口大，那麼貨幣價值就不可能保持穩定，由此導致匯率波動和相應的國際收支狀況變動；同時，投資與儲蓄之間的缺口將使國內商品價格發生變動，從而影響出口商品價格以及進出口商品比價。因此，國際收支變動無論如何難以避免。

如果我們進一步把對外貿易和資本國際流動都包括在對外經濟活動之內，那麼經濟內外均衡的關係仍然存在。在這時，有三個差額對收入均衡發生作用：一是投資與儲蓄差額，二是進口與出口差額，三是資本流動差額。只要有一個差額存在，那麼另外兩個差額之和也就不應當等於零。換言之，三個差額中，如果有兩個差額之和不等於零，那麼第三個差額就不能等於零，否則總體收入均衡就無法維持。

在非均衡條件下，國內的均衡是不容易維持的，這不僅是由於國內的非均衡使得對外經濟活動不會表現為均衡形式，而且由於在國內無法維持均衡的條件下，貨幣或商品價值的變動將對進出口和資本流動發生影響，使對外均衡狀

況也難以維持。

三 中國國際收支問題的 癥結

總體來說，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特徵是：第一，由於有關企業的自主權未解決，因此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第二，由於市場機制不能自動調節失衡，因此，一旦出現收支不平衡，經濟本身沒有矯正這種不平衡的力量。因而，對外經濟的非均衡是慢性的、長期的，它只會在某些階段內由慢性的轉變為急劇的、尖銳的，而不可能由慢性狀態趨向於消失。

從實際角度看，國際收支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之和，前者是主要的；而在經常項目中，對外貿易又佔主要地位。因此，目前中國國際收支緊張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三項，即出口貿易不順利，進口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外資引入有困難。這些原因都與中國處於第二型非均衡狀況有密切關係。

出口貿易不順利無疑同國內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低，商品生產成本高，質量差，不適銷對路，外貿經營管理水平低，匯率調整不及時等等有着直接的關係。但如果深入考察，那麼就可以見到深層原因在於外貿企業缺乏活力和適應世界市場變化的能力，以及價格比例不合理，市場不完善，這就是第二型非均衡經濟在外貿領域內的表現。

進口之所以會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則在於國內資源供給和對國外技術設備、原材料的需求都隨經濟增長而增加。這些問題難以解決，仍然是同第二型非均衡經濟的特徵有關。這就是進口隨經濟增長而增長的深層原因。

至於外資引入困難，除了由於經濟立法不完備以外，主要是由於價格、市場、基礎設施、工人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問題，以致外資卻步。價格和市場方面的問題，與經濟的非均衡有關，而基礎設施落後和工人技術水平較低，歸根結

蒂，仍然同企業缺乏活力、企業尚未成為利益主體有關。這充分說明了第二型非均衡狀態的存在是阻礙外資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僅如此，外資引入的困難，還應當從償還的角度進行分析。假定對外資的利用有效率，償還能力充裕，那麼從中國引進外資的容量來看，利用外資的規模必將迅速增大。然而由於企業缺乏活力，對外資的利用效率不理想，加之市場不完善，於是中國的償還能力也就受到了限制。這同樣反映了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外資引入的困難。

四 市場調節的方法與限制

價格調節與數量調節是在經濟出現供求脫節時的兩類不同調節。調節的出發點是市場事先不均衡。調節想要實現的，則是事後的均衡。至於究竟應採用價格調節抑或數量調節則取決於市場（包括商品、資金、勞務市場等）事先不均衡的程度。不均衡狀態越嚴重，數量調節就越重要；反之則價格調節就重要一些。

數量調節的具體形式就是數量配額，即在供給小於需求時，把有限供給分配給各需求單位；在供給大於需求時，把有限的需求分配給各個供給單位。因此，數量配額是指有限資源或有限市場的分配，由之而實現的均衡稱為配額均衡。這只可說是特定意義下暫時的、事後的均衡，它的位置是由供給或需求中短絀的一方（短邊）所決定的。交易者之所以接受數量配額，因為這是在數量限制條件下能使交易雙方得到某種妥協，從而獲得相應利益的一種交易方式。

從中國的市場狀況來看，非均衡的商品市場主要反映於貨源有限，非均衡的資金市場主要反映於資金供給有限。在這樣的非均衡經濟中，數量調節主要以解決資源（包括資金）短缺為目的，即在商品市場上通過各式數量分配使需求者之間達成妥協；在資金市場上，通過不同方式的信貸配額使資金需求者間

達成妥協。儘管妥協總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但它們卻是必要的，否則生產將會因資源供給的約束而無法進行。數量配額之所以成爲經濟非均衡條件下的必要手段，正是由於它構成經濟順利進行的前提。

五 數量配額的原則與限制

不能簡單地認爲價格調節主要同市場調節有關，而數量調節主要同政府調節有關。無論市場調節或政府調節都包括價格調節和數量調節兩個方面。就市場調節而言，價格調節是指：在政府不干預價格變動的前提下，市場供求關係自發地引起價格升降，由是導致供給量或需求量的增減，從而使供求關係趨向於均衡。就政府調節而言，價格調節是指：在供給或需求出現缺口時，政府提高或降低計劃價格，規定市場最高限價或最低支持價格，以及指定市場價格以一定的浮動幅度等等。可見，無論在市場還是政府調節下，價格調節都是指價格的變動對供求關係的影響。二者的區別在於：市場的價格調節指價格自發變動所引起的供求關係調整，政府的價格調節則是指政府對價格加以干預，由是引起供求關係的調整。

現在讓我們再分析數量調節。從市場調節的觀點看，要把有限供給（貨源）分配給眾多需求者，或把有限需求（銷路）分配給眾多供給者，大致上可以有兩種分配方法。一是按優先原則分配，即「先來先買，賣完爲止」，或「先來先賣，買完爲止」。在這種情況下，誰搶先一步，就在買賣上佔了優先。但究竟是誰能「搶先一步」呢？這一般是由於機遇，或者由於事先得知某些信息，從而比其他競爭者佔了有利位置。另一種分配方式稱爲寡頭原則，即是在寡頭條件下協商分配。這是指：如果有少數能夠控制市場的寡頭，那麼通過它們之間的協商，就可以實行數量配額，按既定比例瓜分貨源或市場。以上兩種分配方式，都屬於市場數量調節，

它們都是在政府不參預下的數量調節。

至於政府的數量配額則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第一種方式是平均分配，即供給有限時，政府根據需求者所需求的數量和可供的資源數量，將有限資源平均分配給需求者；在需求有限時，政府根據供給者所提供的數量和需求者所需要的數量，將有限銷路平均分配給供給者。

第二種方式是按歷史比例原則分配，即根據以往交易中在不同供需者間已經形成的供需比例或過去一貫沿用的資源或市場分配比例來確定目前的資源或市場分配。換言之，「過去怎麼分配，現在就按照既定比例分配。」

第三種方式是按目標原則分配。目標原則是指政府按照事先制定的目標，按輕重緩急而分配。這樣可以保證被列爲重點需求者能夠基本上滿足需要，或被列爲重點供給者把商品銷售出去。

政府在進行數量調節，實現配額均衡的過程中，究竟怎樣選擇所要遵循的原則呢？平均原則、歷史比例原則、目標原則各有一定適用範圍和利弊，因此，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作選擇。在實施時平均原則可能遇到的阻力較小，因爲這是眾多需求者或供給者都覺得合理而可以接受的分配原則。特別是在居民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的場合，按平均原則實行數量配額有着維持安定的作用。但生產資料供給不足時平均分配將會降低資源利用效率，從而使得本來就短缺的生產資料更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而在商品市場上需求不足時，採取平均分配的做法，則可能阻礙產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維持低效率經濟運行的現狀。

歷史比例原則在實施時可能遇到的阻力也較小，因爲這樣眾多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的磨擦減少；如果其中有些人對分配結果不滿的話，可以歸咎於歷史，而不必歸咎於現行政策。當然，問題在於既定的數量分配比例是否合理，以及這種比例是否應當根據經濟狀況的變化而大幅度修改。此外它和平均原則

一樣，也可能阻礙產品、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強低效率經濟運行現狀的持續。

從理論上說，除了少數居民生活必需品有必要採用平均原則進行分配以外，目標原則應當是較為合理的。根據目標原則，政府有責任按照輕重緩急順序來分配有限的供給（貨源）或需求（銷路、市場），這樣既有利於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和產品、產業結構調整目標，也可以保證重點項目、地區的建設。但在實施目標原則時困難也較大。

首先，按照目標原則分配，那就必然使一部分供給者或需求者得到照顧，另一部分人受到損失，即與實行平均原則或歷史比例原則時相比受到損失，於是就會引起後者的反對。

其次，目標原則在指導思想上雖無可非議，但目標的順序究竟如何制定，輕重緩急的排列究竟是否合理，實際的數量分配方案究竟能不能促進資源利用效率等等，卻大有爭論餘地。不同的供給或需求者從自身利益出發，自不免對政府制定的目標順序提出種種責難。

再次，政府在數量配額方面所制定的目標，並不等於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所制定的目標。二者是有區別的。要知道，政府在數量配額方面制定的目標，無非是指政府認為甚麼樣的供給者（或需求者）最重要，甚麼樣的次要，甚麼樣的更為次要，等等。這樣的排列，是爲了在供求脫節時根據產業政策的要求來安排有限的供給或需求。然而，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看，問題顯然要複雜得多。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一個體系，諸如就業、物價、經濟增長、國際收支等等目標都只是這個多目標體系的一個構成部分。政府按照目標原則實行配額時，能不能同時兼顧多個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呢？這是有爭議的。

比如說，在資源供給不足時，如果優先供應某些受照顧的部門，這固然可以保證這些部門的產值不下降，但結果能否兼顧就業問題或國際收支，則是不

確定的。假定這些部門的勞動密集程度較低，而另一些在資源供應上未受照顧的部門的勞動密集程度較高，顯而易見，這樣的數量配額方案就會使就業問題尖銳化。同樣，假定受照顧的部門以產品內銷爲主，而另一些未能受到照顧的部門是以外銷爲主的，那麼這方案將使國際收支變得緊張。這就反映了以目標原則來作數量分配的局限性。

由此看來，爲了兼顧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多個目標，在非均衡條件下，政府只有採取折衷辦法，即要同時考慮到平均原則、歷史比例原則、和目標原則的適用性和局限性，在實施上兼用這三種原則。這正是現實條件下中國所實行的政府調節（政府主持下的數量配額）的特點。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自然也不免受到這些數量配額做法的影響。

六 政府數量配額的困難

作爲投資主體的企業倘以獲取利潤作爲主要投資動機，即使在只存在一種投資機會的情況下，企業仍面臨機會成本的估算問題，也就是資源使用方向和組合形式的選擇。但如果企業尚未成爲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它的資源投入和組合卻不受利益的支配和約束，由是企業對於政府採取的數量調節措施缺乏應有反應。比如說，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政府根據一定的原則實行數量配額，那麼企業必然會全部或部分遇到配額不足的情況，由是這些企業或者須停產、減產，或者須用高價去取得配額所不能給予滿足的產品。二者的結果都可能使企業在經濟上遭到損失。但由於企業本身並不承擔這些損失，所以它們缺乏因配額不足而轉產或實行資源重新組合的內在動力。事實上，由於生產要素市場不存在或不完善，企業亦沒有轉產或實行資源重新組合的現實可能，因此，政府的數量配額在這種場合就起不了改善資源配置狀況和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政府反而必須承擔企業因配額不足而遭到的經濟損失。至

於配額能夠滿足需求的企業，則成了受特殊照顧而佔有優越地位的單位。在企業缺乏活力的狀況下，這些企業只能安於現狀，而無法致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調整資源配合方式。所以經濟的低效率運行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狀也就不會有所改變。

不僅如此，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企業不能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意味着企業沒有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也就是說，企業同權力機構往往是結合的，於是就產生這樣一種不合理的現象，即哪一個企業能同更高級的權力機構有較密切的聯繫，它就能獲得有利於己的數量配額。這樣，也就達不到配額均衡原來預定的目的，經濟中本來存在的供給缺口或需求缺口非但不可能改善，甚至還會加劇矛盾。

七 政府實行數量配額對涉外經濟活動的作用及後果

下面從出口商品生產者、使用進口商品者和利用外資者這三種企業對政府數量配額的反應來分析。

首先看從事出口商品生產者。生產出口商品是需要一定的資源的，其中有些是國內的稀缺資源。為了解決資源不足問題，政府不得不採取數量配額，並且把出口商品生產者同內銷商品生產者放在一起考慮，這就會引起對外經濟與國內經濟之間矛盾的深化。政府固然可以制定產業傾斜政策來處理這種矛盾，也可以在出口導向戰略與進口替代戰略之間作出選擇，以緩和內外均衡之間的不協調。但只有在企業從作為行政附屬物的地位轉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地位，政府對稀缺資源的數量配額才能真正起到緩解上述矛盾的作用。

其次，看應用進口商品如原材料、燃料、技術設備等生產資料的企業。所以要進口，是為了解決國內資源供給的不足。但進口商品需要外匯，而外匯同樣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實際上有

一先一後兩種數量配額，即先是外匯配額，然後是進口商品配額。在政府的數量配額下，使用進口商品者的需求，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得到滿足，甚至完全得不到滿足。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配額獲得進口商品的企業能否很好地利用這些配額，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於是問題又同前面一樣，那些得到特殊照顧的企業不一定能有效地利用進口商品，而未能得到特殊或足夠照顧的企業則會讓政府去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

最後，讓我們對利用外資的企業進行分析。這個問題大致上同使用進口商品的企業一樣，因為外資可以當做一種稀缺資源，有了外匯，就可以既彌補資金供給的缺口，又彌補商品供給的缺口。因此，它同樣會導致上述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所難以避免的種種現象。由此導致的外資償還能力的不足，正是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對外經濟活動中經常遇到的困難。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得出下述結論：要使得中國今後在對外經濟活動中的狀況有改善，例如增強出口競爭能力，提高進口商品的使用效率和外資利用效率，以及外資償還能力的增大等，首先應當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使企業及早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使企業具有充分活力，既能適應國內外市場的變化，又能不斷地改善自身的經營，提高經濟效益。當然，要想使中國經濟從非均衡狀態轉入均衡狀態，絕非易事。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資源供給的缺口（或某些商品的需求缺口）仍將繼續存在，市場的發展和完善也會有一個漸進過程。因此，中國經濟的發展實應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企業盡快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從而使中國經濟由第二型非均衡狀態過渡到第一型非均衡狀態。第二階段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使中國的市場趨於完善，價格趨於靈活，資源供給缺口與需求缺口趨於縮小，於是

中國的經濟將有可能從非均衡狀態接近於均衡狀態。對現階段、甚至對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中國經濟而言，冀望經濟的均衡是不實際的。

當中國經濟仍處於第二型非均衡條件下，指望通過政府的數量配額來消除供求缺口，那麼這至多只是一種治標之策，它無法使中國的資源配置格局有實質性的好轉，而中國經濟會因此持續停留在極不合理的非均衡狀態，使現代化目標遲遲不能實現。

厲以寧 為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在十年中國經濟改革中，厲教授為提倡股份制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中國經濟往何處去》等十餘種。